

再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田野调查方法

徐磊

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代传承或当下意义构建，离不开科学系统的田野考察。只有挖掘出它在民间的当下坐标位置，才能对其此在的文化生态有更详尽的把握。掌握正确的方法论，是田野调查成功的基石。但在过去的田野调查中，由于种种原因限制，我们的许多田野调查或流于形式，或“按图索骥”，或过于“书卷气”，往往走向一种僵硬和空洞。本文试从文化生态、现象学和三元事象论等视角对非遗田调方法进行一种新的思考，以期在方法论上起到填补空白作用。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田野调查方法；现象学；事象论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态的、流动的，而不是僵死的、凝固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它的传承和延续，不像物质文化遗产那样有形可依，有章可循，而是更多地取决于人的因素。毋庸置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代传承或当下意义构建，离不开进一步的田野考察。只有挖掘出它在民间的当下坐标位置，才能对其此在的文化生态有更详尽的把握。掌握正确的方法论，是田野调查成功的基石。但在过去的田野调查中，由于种种客观原因的限制，我们的许多田野调查往往流于形式或过于“书卷化”，甚至完全按调查者本人的意愿按图索骥，这样的调查使得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走向一种僵硬和空洞。这主要表现在：

不重视非遗的文化生态，尤其不重视其“民间性”。在搜集、整理过程中，往往以雅化俗。

对非遗所指的动态性认识不足，在对某一采集地进行田野考察之后，便一劳永逸地认为该处田调工作已永久完成。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承过程中是动态的，不断发生变化的，对这种动态传承的特点理解不够。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态性认识不足。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一经整理完毕，就导向过去时。我们的田野调查工作应当更加注重现在时：研究现场被访人的讲述、被访人的生活环境、调查者和被访人互动的访谈场景以及影响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当下文化因素都是有意义的。

调查者往往预设太多调查目标或怀揣预先成见，甚至为被访者挖掘“陷阱”，使其落入种种预设的表格文本中。

对意义的辨析和把握未做到理论提升，只是在完成从感性认识到感性记录这样一个过程。对感知的目标和结果不能完成理性梳理。

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我们尤其要重视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的文化生态。这种文化生态的核心在于其民间性，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萌芽就发轫于民间。以民间传说“牛郎织女”为例，《诗经》中对于“牛郎织女”的记载就是一种民间疾苦的直接反映，即便到了《古诗十九首》时期，《迢迢牵牛星》也是一种民间创作。在“牛郎织女”传承的过程中，许多包括剪纸、刺绣、年画、戏曲等在内的民间艺术无不在用多彩的形式诉说着牛女爱情，寄托着美好的爱情理想。由于地域文化的差异，各地的不同异文如遍野荒草顽强生长着。民间艺术作为一种生活形态、艺术形态，与民众生活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民间的信仰观念、伦理情感、审美精神都与民间艺术无法割裂。我

们不仅要把文化学、民俗学、艺术学运用于“牛郎织女”研究，还必须把文化生态学等相关理论与方法融入其中，从而全面地揭示了“牛郎织女”的文化生态基础。“牛郎织女”的生存土壤决定了其与主流文化在形式方面的巨大差异，我们不能用雅文化的思维模式去“改造”其“俗”文化，从历史性的眼光看，雅、俗从来都是相对的，并且可以相互转化的。

像“牛郎织女”这样的民间传说，自始至终都处在流动传承中，自“牛郎织女”萌芽伊始，便与农耕文明的种种文化特征以及发展变化中的社会语境不断发生融合，处在一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流变之中。由于它的母题性特征，历史上从来都不缺乏对它的再创造。今天，我们的社会正处在一个转型时期，文化也走向一种多元化。当代中国文化已经走向了一种历史性文化的共时性承受，在当下的文化舞台上，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现代文明同时展开。我们已经在文化上进入文化复调时代。即便是在农村，工业文明、后现代文明也已无孔不入。所以，“牛郎织女”的现代传承势必要与当下种种文化的多元性相联系，而且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着嬗变。我们的田野调查必须认识到这种瞬息万变的文化流变特点，对“牛郎织女”的考察宜走向段落式，切不可一劳永逸。唯其如此，才能更好地把握其在现代语境中的传承特征，构建其现代意义。

我们应该把所有业已整理过或已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一切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文本看做其“过去时”，文本一旦完成，便不属于创作者，而属于受众，走入历史性视野。任何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代意义重构，必须着眼于当下，注重当下的人文环境和情态。我们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田野考察中，应该把被访人的讲述、被访人的生活环境、调查者和被访人互动的访谈场景以及一切影响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当下文化因素都考量在内，从而把非遗现时传承的文化因子紧密结合到田野调查文本。当然，所有的田野调查都将成为历史文本，但它的“此在”意义是不可忽略的。

较之于古代哲学家，近现代哲学史上的哲学家在整体上无疑把研究范畴缩小，走得更为谨慎。他们不再追求一个包罗万象的宏大体系，却在方法论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就现象学而言，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我们可以从其现象学、社会学得到这样的启示，“存在”“有”就是作为直觉性的事物本质的自我呈现的意义的一种显现，只是我们有没有感知它或者发现它。换言之，我们能够获得对这样的意义的认知，但要建立在我们去感知或者去发现的基础上。这就

需要认识和把握社会行动者的主观意识，胡塞尔提出了“悬置”这一概念或方法，并以此构成感知的前提和必经的步骤。

我们每个人都在其自身的日常生活中具备一种自然态度，我们通常会这个世界：包括自己的世界视为理所当然的存在并将自己与他人的沟通视为理所当然。这也就是人们对生活所持的最初的、朴素的、未经批判反思的态度。

而胡塞尔就是要这种使属于自然态度本质的总设定失去作用，当然这不是说它毫无作用或者无效，而是我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不再使用与之相关的任何命题、概念和真理。胡塞尔认为，只有经过悬置，才有可能去讨论作为“世界消除之剩余的绝对意识”^①。

同样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领域，我们可以运用这种悬置的方法，对我们研究者自身的日常生活知识体系和业已形成的人文社科体系、各种知识或判断进行悬置，如胡塞尔所言，对我们原有的自然态度以及科学态度的判断暂时中止。因为我们在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时，不可避免地会根据我们以前的知识对研究对象进行某种理论预设，尽管这种预设不能完全避免，但这里我们需要悬置的是我们自己原来持有的“成见”、对于某些东西的习惯性信仰等。现象学社会学所说的悬置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在排除了研究者自己先入为主的各种成见和观念之后的对访谈对象，赋予访谈与访谈场景的意义的感知和认识。而我们这里要运用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的悬置是对于这一研究方法或概念的借用，两者之间有相同之处，但后者主要是要对附着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上的历史文化隐喻进行剥离与分解，在解构之后重新对其进行新的结构，以期发现它在当下时代的意义。而这一悬置方法的使用对于我们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田野考察也有着重要意义。

在调查过程中，调查者往往预设太多知识体系或预先成见，在访谈过程中牵着受访人的鼻子走，使其按要求、守规矩地走入事先预设的表格文本中。这是一种僵硬的田调方法。这里，我们还是借用胡塞尔现象学的“还原”“悬置”理论，这种理论是我们进行非遗田野调查的前提。在调查开始后，我们必须中止自然态度下的判断，排除种种预设的理论前提，把种种以“真理”面孔出现的知识体系暂时“悬置”。我们预先的成见，我们的知识，我们的信仰，从田野调查伊始，就要退出现场。我们应该去把握受访人的种种生活情态、生存环境、言行举止，制造一种“调查者”不在场的氛围，来获取调查现场第一手感性材料。这种方法也受到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影响。在海德格尔看来，超时空的纯粹先验自我事实上并不存在，胡塞尔现象学中“纯粹的先验自我”并非真正的“实事本身”，存在的只是被抛在时空中并不得与他人共在的具体个人，即“此在”，它才是思想应回到的实事本身。只有把握了“意义之在”的存在才能理解“人的存在”即此在。“存在”即是让事物达到自身显现。艺术作品和艺术家之本源是艺术。海德格尔用“世界”与“大地”这一对概念来阐释艺术作品的本源，借以表达“意义化”和“无意义化”的对立冲突。艺术作品建立了一个世界，同时展示了大地，在世界与大地的冲突中，

作品描述的存在者既显示（获得意义）又隐匿（失去意义）地出场，艺术作品也因此而成其所是。所以，我们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田野调查过程中，应该“悬置”预先成见，让其“意义”自我显现，进而把握意义。

对意义的辨析和把握，不能单纯停留在感性层面，而要作一种理论上的提升，从而对感知的目标和结果完成理性梳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世界里的事象包括民间传说、剪纸、年画、戏曲和手工艺品等中的人、物、声音、行为、事件等等，而学术界可以将事象世界一分为三，即“物”的物理（广义）事象、“心”的心理事象和“人”的人文事象。这也是许多本体论哲学家进行研究的三个不同的出发点。古往今来，哲学家们或以“物”（某种物化的基质或物体），或以“心”（灵魂、精神、观念、绝对理念等），或以“人”（自我、生存意志、群体生命）为本原，构建了丰富多彩的哲学体系。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不见得要以一种一元论的路子来行进，将三种研究视角结合起来，对事象进行一种三元化分析，使之导向一种动态。这就需要“物象”“心象”和“人文事象”的本质进行把握和分析，而呈现在我们的调查过程中的三元事象又不是孤立的，甚至它们会产生同化互补，这就需要我们对于“物——心”“物——人”“心——人”等关系维度进行具体分析。按照现代美学观点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形态的再创造过程中，“物”“心”“人”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三元事象论的理论体系为这种意义的辨析与把握提供了一种有益的视角与方法论。

此外，我们必须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代意义构建中存在的另一个问题保持警惕，那就是部分民间艺术作品的现代化。海德格尔曾经对此问题作过揭示，在他看来，由于现代技术统治切断了艺术与自身本源的关联，现代艺术已经异化，它漂离了它的本质，不再是原初的真理发生的基本方式。而我们在一些与民间艺术相关的现代艺术作品中，也发现了诸多“后现代主义”特征显著的“恶搞”作品。在艺术文化多元化的今天，我们没有必要对此现象进行高调批判，但这种再创造创作方式的肆虐，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诗性的存在是一种挑战，无益于其现代传承和意义构建。这个问题则更加凸显出田野调查的重要，它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

注释：

①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M].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133

参考文献：

- 1.潘鲁生.中国民间美术学导论[M].哈尔滨：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03
- 2.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M].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 3.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上海：三联书店，2006

徐磊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人文艺术学院讲师 博士

再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田野调查方法

作者: [徐磊](#)
作者单位: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人文艺术学院](#)
刊名: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 [Art of Design](#)
年, 卷(期): 2011(5)

参考文献(4条)

1. [胡塞尔;李幼蒸](#) [纯粹现象学通论](#) 1992
2. [潘鲁生](#) [中国民间美术学导论](#) 2003
3. [胡塞尔;李幼蒸](#) [纯粹现象学通论](#) 1992
4. [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 2006

引用本文格式: [徐磊](#) [再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田野调查方法](#)[期刊论文]-[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学报](#) 2011(5)